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
元
明
清

己酉年

译注 李 庆

审阅 黄永年

资治通鉴选译

資治通鑑選評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图：任兆祥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资治通鉴选译

李 庆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1990年6月第一版

印张 7.875 字数120 千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DT14/18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

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在世界各民族中，我们中华民族是最重视历史记录的。就保存下来的古代史书来看，最早的《春秋》，就是鲁国史官所记录的从公元前722年到479年二百四十四年间发生的大事。这比西方最早的史书——公元前五世纪末才出生的希罗多德编写的《历史》要早出二百多年。《春秋》是按年月日顺次记录下来的，后人称之为编年体史书，即编年史。鲁国以外其他诸侯国以至周王室也都有这样的编年史，如西晋时从古墓里发掘出来的一部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的，也是和《春秋》同样体裁的编年史。可以说这种编年史是我国最早编写史书所用的体裁。但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史书的体裁也没有例外地要有所发展。到

西汉前期就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的内容要比《春秋》复杂多了。它有“本纪”，这是以帝王在位先后按年月日编写的编年史，和《春秋》还没有什么不同；另外还有“表”，用表格形式来编排大事；还有“书”，后人改称为“志”，分专题记载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还有更大量的“列传”，分别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这些就远远突破了编年史的格局，所以后人给它另起了一个名称叫纪传体史书即纪传史。因为这种体裁比编年体更完善，所以后人又称之为正史，以《史记》居首的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都是用这种纪传体来编写的。当然，在编写纪传史的同时也还有人在写编年史，如《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汉书》在东汉初年由班固编写后，在东汉末年还有位荀悦编写了编年体的《汉纪》，但内容远不如《汉书》充实，很少有人阅读。直到北宋时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问世，编年史才可算恢复了它的地位，有资格和纪传体“正史”并驾齐驱，甚至有人把他和纪传史的始祖司马迁称为我国古代史学界的“两司马”。

司马光这位大史学家的名字，读过点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陌生。北宋时大政治家兼大文学家王安石在搞变法时，司马光正是个出头露面的反对派。他是

陕州夏县人^①，字君实，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19）出生，活了六十七岁。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逝世。在他生活的时代纪传体正史已先后出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一共十九部，部数多，分量大，凭一个人的精力很难看得完，需要再有一部既能包括这些纪传史的主要内容，又比较简明的史书，司马光就是针对这种需要来编写《资治通鉴》的。他没有继续沿用纪传史的体裁，因为这样无非是把以上十九部纪传史压缩一下。司马光小时候就读过唐朝人高峻把《史记》到《隋书》缩编成的《高氏小史》。小时候读读固然可以，作为成熟的史学家就决不愿意重复这种简单劳动^②。他重新采用了当时多少已被冷落的编年体，来编写一部比这些纪传史简明的史书。前面说过，编年史的老祖宗是鲁国史官编写的《春秋》，我们

①今山西夏县。 ②司马光以后还有做这种压缩正史的工作的，如南宋吕祖谦编写的《十七史详节》，明代邵经邦编写的《弘简录》，就都是这种压缩性质，可是一直很少有人去谈，人们对压缩饼干总是不太感兴趣的。

看到的《春秋》是所谓《六经》或《五经》里的《春秋》，是经过先秦时儒家删节过的内容比较简单的本子，一件大事只记上一两句。如果这样，司马光倒仍旧不必花气力，把传记史里的本纪照抄一通就是，本纪就是和《春秋》差不多的简略的编年体。司马光不做这样取巧偷懒的事情，他要模仿的是《左传》。《左传》这部书后人把它编在所谓《十三经》里面，其实并不是经，只是解释《春秋》的书，不过不是解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怎么念，而是战国前期人收集了各个诸侯国的史官的记载，针对《春秋》只记载某年某月某日这个诸侯国和那个诸侯国打了一仗，某国打赢了的简单记载据史实加以全面扩充而成。《左传》中详详细细记述了双方将帅的情况，打仗的经过，以及胜败的原因，读起来比《春秋》有趣味得多。司马光从小就喜欢这部有趣味的《左传》，据说七岁时听别人讲解后就能对家里人复述其中的情节，成年后写《资治通鉴》就采用了《左传》的记述方式。《左传》最后讲到韩、赵、魏三家灭掉智伯，所以《资治通鉴》也从“三家分晋”讲起，或者就是从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讲起，一直讲到五代结束，北宋太祖当上皇帝为止，也就是从公元前403年讲到公元959年，一共1362年的历史。一共写了294卷，前面所

说的那十九部纪传史加起来有二千卷左右，《资治通鉴》在卷数上远不到这二千卷的1/7。

现在再说司马光的这部编年史为什么叫《资治通鉴》，这得弄清楚他对编写史书的理解，和他与封建政治的关系。研究历史，编写历史书干什么，我们今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很清楚，主要是为了弄清历史发展的规律。弄不清规律严格地讲就算不上科学，同样算不上历史科学。但古人不是这样，作为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要找寻规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研究历史，编写历史书，主要目的是在于借鉴，前人做对了的后人可以学，做错了的后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司马光当然是跳不出这个圈子的。同时，还应知道司马光是个政治家，早年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想有点作为则需要有一个他心目中的好皇帝，因而他不仅需要自己从历史上有所借鉴，更重要的还希望皇帝也从历史上有所借鉴，学好皇帝而别做坏皇帝。他从仁宗嘉祐年间开始编写这部编年史，当时起的书名叫《通志》。仁宗死了，英宗即位，他把已编写好的从战国到秦一共八卷进呈给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在治平三年（1066），英宗叫他把历代君臣事迹编集起来，他请示是否就把《通志》编下去，英宗完全同意，并专门为他设置编纂的机构——史局，使这

部大型编年史成为官修的史书。这样，这部史书的内容就更要投合皇帝的需要。英宗做了四年皇帝就去世，神宗刚即位，就叫司马光把已经编写好的在经筵^①上宣读讲解，并且叫文臣王禹玉代笔赐给一篇御制序，对这部书的政治作用作了全面的肯定，并且给它正式赐名为《资治通鉴》。“资”是资助，“治”是治理，“鉴”是鉴戒，“通”是“通志”的“通”，因为它不止记载一个朝代，而是从战国一直通下来，整个书名，就是有助于治理天下的一部通代鉴戒之书^②。这本书里经常看到“臣光曰”也就是“臣司马光认为”，就是司马光根据历史事实中所发挥的给皇帝借鉴的言论。这种充满着封建地主阶级气味的言论，今天我们当然是不会欢迎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能这么做也有不少好处。首先是打着奉皇帝诏命官修的旗号，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收藏的极其丰富的图书资料。其次是准许司马光自己挑选助手进史局协助他工作，在英宗时他已先后选用了刘恕、刘攽^③，神宗时又增加了一位范祖禹，这三位都是颇有名气的史学家，刘

^① 皇帝选了文臣给他讲书，叫开经筵，所讲的一般是《五经》之类，新编写的《资治通鉴》能列入宣讲内容，可见神宗对它的重视。^② 后来常把它称为《通鉴》，把“资治”两字省略掉，只是为了方便而已，严格讲并不符合神宗赐名的本意。^③ 攽（bīn宾）。

攸协助从汉到隋部分，范祖禹协助唐代部分，刘恕协助五代部分，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再有一点，由于经过皇帝肯定，可以不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在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反对派司马光在熙宁三年（1070）被迫离开京城开封，到当时称为西京的洛阳去做无事可管的闲散官职。但神宗对他编写《资治通鉴》还是十分支持，准许他把史局带到洛阳继续工作。过了十四年在元丰七年（1084）年底把这294卷的大书顺利写成，连同《目录》、《考异》各30卷一并进呈后，神宗还专门下诏奖励，把司马光调回京城重新出任要职。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当了不到一年宰相在元祐元年（1086）九月去世，十月份仍由当时的文教机构——国子监奉诏敕把《资治通鉴》刊刻颁行。哲宗亲政，司马光的反对派抬头，要毁掉《资治通鉴》书版，因为有神宗御制序仍不能得逞。如果《资治通鉴》这部书不紧密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绝不可能得到这么优待的。

《资治通鉴》问世后我国还经历了七百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资治通鉴》一直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畅销书。不仅读，而且给《资治通鉴》做了不少注释和改编工作。注释中最著名最有经验的是宋元间胡三省的音注，通常称为《通

鉴》胡注，对《资治通鉴》里讲到的地理和制度解释得特别详细。改编的书中最有意义的是南宋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是考虑到《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一件事情分隔在好几卷里，初读者往往理不清头绪，于是改成以事为主，把全书归结成239件大事，每件大事下抄录《资治通鉴》有关的原文，无关的另星记载统统舍弃，这样就创立了和纪传、编年并列的纪事本末体，读编年体有困难的人看读纪事本末就比较容易读得进去。还有一种改编是不变编年体裁，只把《资治通鉴》加以删节改编，像南宋时托名朱熹编写的《资治通鉴纲目》、清初吴乘权、吴大职合编的《纲鉴易知录》，乾隆时官修的《御批通鉴辑览》，就都没有什么价值，即使在封建社会里有学问的人也不屑一读。此外，因为《资治通鉴》只编写到五代，以后还有人给它写续编，高质量的是南宋史学家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他如清代以毕沅名义编写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陈鹤的《明纪》，据说也都写得不太坏。

今天中国社会性质早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写出更好更适合社会主义需要的新史书，但《资治通鉴》这部旧史书仍没有失去阅读的价值。这是因为：

首先，对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来讲，《资治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编写时除了利用前面说过的从《史记》、《汉书》到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十九部纪传体正史外，还利用了其他的纪传史、编年史、杂史、名人的传记、名人写给皇帝的奏议，以及有关各个时代的地理记载和比较可信的小说杂记，据统计有三百多种。其中有许多很可以补充那十九种正史的不足，甚至纠正其中的错误。尤其是唐和五代部分，编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时所根据的原始史料司马光都能看到，《资治通鉴》的唐五代部分有很多不见于这些正史的，就大多是根据这些原始史料重新编写的，而这些原始史料后来都已散失，因此《资治通鉴》这部分的史料价值至少不亚于正史。同时，编写《资治通鉴》时是先编“长编”，所谓“长编”，就是按年月日把有关史料统统抄到一起，成为资料汇编，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写成正式的史书。“长编”后来虽已散失，但还留下了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考异》，把某件事情有几种不同说法的史料都记下来，然后讲明为什么信这种，不信那种的理由，也就是去伪存真的理由。有些确实取得很对，即使不对，但既已记下了各种不同说法的史料，而且这些史料已经失传在别的地方无法

看到，今天的专家学者还可根据《考异》来重新加以判断抉择。所有这些，都是专家学者们极为欢迎极对胃口的，尤其是研究唐五代史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位不在《资治通鉴》和《考异》上下功夫的。

其次，《资治通鉴》的文章实在写得好。编写史书要讲究文采，要写得对人们有吸引力，叫人们愿意读，这本是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纪传史中的《史记》、《汉书》等之所以享有盛名，就不仅因为有史学上的贡献，同时也因为有很高的文学水平。不过这些纪传史的文学水平尽管高，却各有自己的风格，如果司马光偷点懒，把它们直接抄到一起，岂不成为五花八门的文字大杂烩。司马光当然不全这么干。据记载，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办法是先请刘放、范祖禹、刘恕分头搞“长编”。

“长编”搞好，再由司马光一手加工写成。所以今天读起来就感到文字前后通贯，294卷大书像是一气呵成。同时，司马光的文笔也有独特的风格，既生动，又条理清楚，平顺易懂，绝不玩弄生字难句来故作高深。因而不仅旧社会的文人爱读，今天稍为懂一点文言文的人即使不是专家学者仍同样爱读，有些地方读起来真像读故事书一样，叫人非读完一个段落，知道事情的结局不可。

问题是现在大多数人习惯读文言文。为了更